

许威汉 主编
现代语言学系列

2

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

申小龙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现代语言学系列之二

许威汉 主编

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

申小龙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现代语言学系列主编

许威汉

现代语言学系列之二

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

申小龙 著

责任编辑 徐豫生 魏亚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武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字数120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70

ISBN7-215-01394-4/Z·82

定价5.00元

《现代语言学系列》序

语言学是基础科学，也是领先科学。语言学的新发展，是时代的要求。

从历史上看，19世纪开始，就有三种因素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作用：一是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发明以及各种学说、社会思潮对语言学产生影响；二是社会的需求推动语言学演进；三是语言学自身要求解决一系列内在问题。而三者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0世纪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应用范围大大超出单纯的数值运算；它与语言学结合，使语言学发生巨大变化，并相互作用，即计算机给语言学发展以影响，语言学对计算机的发展起作用。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人机对话更将不断扩大语言交际职能。语言学的功用自必更为突出，语言学的发展自必更为未来社会所关注。

传统语言学的基础雄厚与否，对解决当前问题和迎接未来任务也举足轻重。随着近年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出现了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的语言学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语言学正面临时代召唤。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的统一。语言学没有例外，必将循途继轨，不断有所发明发现。况且作为一种学说，向来都有补正发展余地，语言学说借鉴外来新知，发扬优良传统，达到后出转精，正是科学发展所使然。

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研习语言热情日益高涨，为适应新形势，“语言学系列”的撰写是十分必要的。本系列书起点高，眼界宽，内容丰富而系统，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和资料性特色，适用面广，语言文字工作者、语言文字爱好者，以及其他各有关学科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通读是书，当可深会而知之。

许威汉 写于上海师大

1990年12月

前 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语言文字的研究与革新曾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冲突、震宕的先导，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之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热潮中，语言的研究与革新将再次拉开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序幕。站在这个新世纪的起点上，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跨世纪的一代，适时地回顾20世纪，尤其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努力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选择和建立新的理论、方法乃至文化哲学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它是在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船坚炮利”的“优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开始现代化的。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传统语言学，也就在这种救亡的“涅槃”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学术形态。这种学术形态静态地延续了数十年，规范着本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其主要特征一是西方近代科学形式化的宗旨，二是西方语言学的范畴。这两个特征使曾与中国文化血肉交融在一起的传统汉语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深刻的

异化，即它不再以使用母语的人与文化为目的，而以某种理想化的形式为目的；不再以汉族人的语感作为建立范畴的深厚的基础，而力图以西方语言的“科学”范畴来规范汉族人的语感。这样一种学术形态，在其长足的发展中，必然伴随着语文感受、文化心理的矛盾冲突与困惑。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文化断裂的深刻的代价。因此，对当代中国语言学的现状所进行的回顾，必然带有反思的性质。这种反思无疑是21世纪中国语言学学术更新的必要的理论准备。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思与前瞻也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这是科学发展的常识。科学始终不渝的任务是通过对一切现存理论的不断批判而获得自身的超越。

要在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对当代中国语言学作总体评价，涉及它的各方面的历史、现状、宏观、微观，并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的建树，这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采用提纲挈领的方法。具体做法是：

（一）紧扣语言分析的两个主要方面——语形和语义——的研究来观察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这两个方面涵盖了中国语言学的大部分学科。

（二）以评为主，以述为辅，评述结合。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作理论上的综览与把握，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不报流水帐。

（三）每一章的写作根据内容的需要分别采取先述后评、先评后述、以评带述、以述带评等多种方法，力求使评和述都能重点突出，每一章每一节都能深化内涵。

本书面世之际，将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告别20世纪之时。历史在前进，传统在新生。新时代的中国语言学告别的是一个一元静止、单序列延伸的学术旧世纪，迎接的将是一个多元发展、百舸争流的学术新世纪。她将努力开掘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沟通的东西，使传统在新的时代阐释中重建，使源远流长的中国语言学在新时期的现代化中获得健全的生长机制和文化心态，从而从容地、朝气蓬勃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目 录

《现代语言学系列》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在反思中前进的共时语形研究.....	(1)
一、汉语虚词的研究传统及其更新.....	(1)
二、汉语动词研究述评.....	(26)
三、汉语语序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42)
四、汉语句型研究方法论反思.....	(58)
第二章 在系统中深入的历时语形研究.....	(95)
一、历史的沉思.....	(95)
二、两种研究倾向的辩证.....	(104)
三、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创新.....	(117)
四、民族的规定性.....	(142)
第三章 前景广阔的词汇语义研究.....	(149)
一、方兴未艾的词汇学.....	(149)
二、异军突起的词义热.....	(156)
第四章 创造性转化中的训诂语义研究.....	(172)
一、训诂学的中兴.....	(172)

二、训诂的文化阐释传统及其更新.....	(179)
三、中国训诂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196)
第五章 百家争鸣的汉字研究.....	(206)
一、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反思.....	(206)
二、中国学术界对汉字的再认识.....	(222)
第六章 新世纪的选择：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	(235)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综览.....	(235)
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纲.....	(249)
后记.....	(276)

第一章

在反思中前进的共时语形研究

语形研究是对语言结构的析解。自20世纪初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以来，汉语的语形分析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语形分析已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个主体学科。这一学科的成果主要反映在词类和句法的研究上，尤其是对虚词、实词中的动词、语序、句型的研究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一个世纪的语形研究中，西方语法学理论既为汉语分析提供了新范畴、新框架、新方法，又对汉语语形的科学认识造成很大的局限，这突出地反映在句型认识上。因此，当代汉语语形的研究是在不断借鉴西方语法分析方法，又不断对这些方法的局限加以反思的过程中前进的。

一、汉语虚词的研究传统及其更新

虚词研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深厚的传统。它的发展，经历了由古典型到近代型，由近代型到变革中的新型研究的递嬗。

(一) 古典型的虚词研究

汉语的虚词研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以《马氏文通》为界，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以前的汉语虚词研究视为一体，称之为古典型的虚词研究。古典型的虚词研究，注重虚词的语文感受及其在句子组织中的表达作用，带有直观性和体验性。在方法上往往采取随文释词和比合同类的办法。纵观一千多年的虚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辞训式的虚词研究阶段

从汉代开始，为探究经义而呕心沥血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就注意到汉语的词并非都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有些词只能从这个词同其他词的连贯中求得解释。在当时的《诗经》毛亨传、郑玄笺里将这些词统称“辞”。如“思，辞也。”“伊，辞也。”在郑笺中已有对虚词意义的进一步说明，如“勿，禁词也。”《说文》中则释得更为具体。如“只，语已词也”，“矣，语已词也”，“哉，言之间也”，“者，别事词也”，“皆，俱词也”，“乎，语之余也”，“兮，语所稽也”，“各，异词也”。这种逐字为训到唐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如孔颖达《毛诗正义》：“然者，然上语；则者，则下事，因前起后之势也”。“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但这种辞训式的方法难以认识古汉语虚词与虚词间的关系。汉语虚词在搞辞训的学者眼里，还只是一盘散沙。

2. 辞气式的虚词研究阶段

辞气式的虚词研究是从文学理论家、散文家那里开始的，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文艺评论的实践中深感虚词体现文章的神情。文章的抑扬顿挫、气韵的顺畅与否，都与虚词的运用有关。辞气式的研究从文句气韵的运行规律出发，开始把虚词按语气的作用加以归类。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文心雕龙》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剡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作者刘勰认为，这些虚词“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辞气式的虚词研究从句子的节律、语气入手贯通虚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把握住了古汉语虚词的真谛。唐代柳宗元又进一步把虚词所表达的辞气分为传信和传疑两类。他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这种分类一直影响现代。元代的学者继承了这种由辞气立论的虚词观。他们认为“庄左马班，手段固殊，韩柳欧苏，家数亦别，然资助於余声接字，同一律令。作文者不於此乎参，其能句耶？”（胡长孺《语助》序）元代卢以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编著了古汉语虚词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语助》。胡长孺认为这部书“匪语助之与明，乃文法之与授”（文法指作文之法），这就充分表明了辞气式虚词研究与辞训式虚词研究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卢以纬的虚词研究善于比较辨别不同位置、不同作用的虚词的声气轻重。例如说“夫”在句首，为发语之辞；在句中，与“乎”字似相近，但“夫”字音婉而声衍；在句末则为句

绝之余声。说“且”有宽缓说来之意，或有漫尔如此之意，或有苟且之意，或有将次之意。说“于”与“於”相类，但比“於”意重。清代袁仁林进一步发挥了虚词研究的辞气理论，他在《虚字说》这部虚词专著中明确指出“虚字无义”，“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如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无论从虚词的产生还是从虚词的实际运用来看，典型的汉语虚词都同语句声气有关。古典辞气式的虚词研究传统在这点上不仅高过前人，而且为后人所不及。古汉语句子中许多虚词的语法作用正是语言声气作用长期的积淀。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对汉语虚词含义的解释不能象一些西方语言解释介词、连词那样有明确的语法规定性。例如《虚字说》解释“乎”、“与”、“耶”三个虚词，在辞气上“均属乎拖长曳，疑活未定”。不同之处在于“乎字气足，与字气嫩，耶字气更柔婉”，因而在作用上“一则实疑未定者，一则谦退带疑者，一则无疑拖语者。”

3. 辞例式的虚词研究阶段

如果说辞气式的虚词研究是用语言声气的作用通贯、条理了古汉语虚词，那么辞例式的虚词研究则是从大量的书证中排比归纳出虚词运用的规律，综合成虚词类别。清代刘淇既是辞训、辞气式虚词研究的集大成者，又是辞例式虚词研究的启蒙者。他的《助字辨略》在虚词的解释上采用了正训

(如“仁者人也”)、反训(如“故”训“今”)、通训(如“本犹根也”)、借训(如“学之为言效也”)、互训(如“安”训“何”，“何”训“安”)、转训(如“犹”有尚义，故训“庶几”)等训释手法，使《助字辨略》成为用训诂学的方法来解释虚词意义的巨大述作。同时在虚词的作用上，他又认为“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也。”这就由辞气派的声气说上升到更注重虚词表情达意作用的“性情”说。刘淇指出：“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坠之际，轩轻异情。虚字一乖，判于燕越，柳柳州所由发哂于杜温夫者耶！且夫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遍篇为之梗塞。”可见刘淇的性情说正是柳宗元等的辞气说的发展。由性情立言，刘淇把虚词分为助语、断辞、疑辞、咏叹辞、急辞、缓辞、专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设辞、发语辞、语已辞、别异之辞、继事之辞、或然之辞、原起之辞、终竟之辞、顿挫之辞、总括之辞等三十类。这是由注重声气作用到注重语法作用的一大进步。这里不仅包含了刘淇本人在前人基础上继往开来的虚词研究创见，而且包含了虚词在汉语发展史上由声气的积淀质变为语法作用的显豁这一语言因素。而虚词语法作用的增强又使得虚词的研究不能再凭天籁，靠诵读来体验，而须从大量的例证中进行归纳。《助字辨略》正是在这一点上又开辞例式虚词研究的风气之先。刘淇在每一个虚词条目下都列出大量书证。这些书证的内容有经传、诸子、诗词、小说等，上起先秦，下至宋元，无所不包。书证以原文为主，有时也引用一些旧注。这样辞例与辞

训、辞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助字辨略》的虚词训释翔实而可靠。例如“哉”字，前人只指出它是句中间隔之辞，句末语已之辞。刘淇引书证指出“哉”作为语已词既可是疑辞，又可是叹词，还可兼疑叹两义而为反设之辞。同是一个“有是哉”，在句中既可为“不足之辞”，又可为“深然之辞”。又如“由”字，刘淇引大量书证辨明它既训“从”，又训“因”，又训“用”，又通犹、犹如。《助字辨略》是古代虚词研究传统上集辞训、辞气、辞例三大研究范式为一身的开创之作。从后来的虚词研究发展来看，它又是古代汉语虚字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以大量的书证来比合推究虚字的作用，必然导向根据辞句的结构判断虚词意义的典型的辞例式研究。继《助字辨略》之后，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将辞例式的虚词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王引之不仅吸收了当时声义相通的理论来判断虚词的同义关系，更为可贵的是他已经能比较自觉地把辞例（辞句的结构）同虚词的用法结合起来，比合许多同类型的句子而又贯串上下文加以推敲，显示出较清晰的语法意识和思路。例如他举“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既诞，丕则侮厥父母”之例，指出它们“皆先言‘既’，而后言‘丕’”，因而“丕”“为承上之词”，即无义虚词或表示承接的关系词。《史记·夏本纪》以“三苗丕叙”作“三苗大叙”，显误。用同样的方法，他又以《诗经》中“终温且惠”、“终窶且贫”、“终和且平”、“终其永怀，又寤阴雨”诸式的比合中论证“终”为表示已

然的“既”。而毛传训“终日风”，《韩诗》训“西风”，都误。王引之深刻地指出，他们误就误在“缘词生训”。而虚词的解释应取“比物丑类”的方法。他的比物丑类的方法以辞例上的比合为主，其中包括举两文以比例的，因互文而知同训的，因古注以互推的。此外，他还旁征博引，辅以版本校勘上的“比物丑类”。

《经传释词》之后，陆续有孙经世《经传释词补》和《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对《经传释词》加以增广和补充。直到近代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以《经传释词》为基础，一方面博采近代各家虚词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对《经传释词》又详加补订，多所匡正，但在辞例式的研究方法上并未有进步。相反，由于作者有浓重的复古思想，把近代语言趋向语法严密的状况比作“山野村夫”，把上古汉语繁复错综的状况看成“巨丽的宫殿”。因而在虚词研究方法上又回到辞训式的研究传统上，全部沿用《尔雅》式的“以词训词”的方法。如“爰，于也，曰也”，“粤，曰也，于也”。这种词间对释往往使近代读者茫然不得要领。这在虚词研究的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

纵观古典型的虚词研究从辞训到辞气又到辞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传统的虚词研究既密切联系汉语虚词固有的特点，又随着语言的发展而趋向语法学意义上的精密化。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及独特的文化性征的优秀语文学传统。一旦借助于西方现代语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就能迅速获得新的活力，从原有的基础上趋向完善。